
“衰世多信鬼”^{*}

——宋季士大夫与相士交往诗文透视

刘婷婷

内容提要 宋季士大夫文集中普遍留有与相士交往的诗文，这些诗文的大量集中出现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是宋季衰世中士大夫命运的折射。透视这些诗文，探讨其成因与风貌，可以了解当时士大夫在庸君权臣政治下的挣扎际遇与茫然无助心理，也有助于对宋季文学的整体深入研究。

关键词 宋季士大夫 相士 交往诗文

钱锺书《宋诗选注》曾论文天祥诗歌云：“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为前后两期。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大得使我们吃惊。”^①钱先生此语虽仅对文天祥而言，却点出了宋季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综观宋季三朝（理宗、度宗、恭帝）文人士大夫诗文，为相士^②赋诗作文的不止钱先生提到的文天祥、姚勉二人，且数量之多同样令人吃惊。这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透视这些诗文，探讨其成因与风貌，是整体深入研究宋季文学的必要环节，是认识宋代士大夫的多元化演变不可或缺的部分。遗憾的是，前人对此评说不多。笔者不揣浅陋，拟解读这些诗文，并从宋季士大夫与相士密切交往的现象、交往增多的社会客观原因、交往的内在主观原因、交往诗文的文学风貌四方面来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

相士起源古老，原属道家方技之流，《左传》多有提及，《史记》为日者立传，历朝相士常出入王侯之家。宋代社会流动加快，人们的财富、地位具有更多不确定因素，为占卜之术大行其道提供了合适土壤，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卜者人数增多，占卜书籍增多，占卜方式增多，占卜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③宋代占卜的世俗化与日常化，使得文人士大夫与相士的交往相对增多，文人别集与笔记小说中留下不少痕迹，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朱熹等人的诗文集中都有类似作品，但相比较而言，宋季士大夫的这类作品尤为集中。

从宋季士大夫别集来看，较有代表性的有文天祥、真德秀、魏了翁、姚勉、刘克庄、李曾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宋社会变迁、士人心态文学走向研究”成果之一（编号 09CZW032）。

① 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56 页。

② 此处所指的相士是统称，包括以相面、摸骨、测字、卜卦、嗅衣、占梦、占星等不同方式为人预言前程与吉凶祸福的算命先生，以及卜宅选坟的风水先生。

③ 杨晓红《宋代占卜与宋代社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94—99 页。

李昂英、陈耆卿、谢枋得等人。笔者曾对他们与相士交往的诗文作了不完全统计。如文天祥《文天祥全集》^①卷一、卷二收其前期诗歌，卷一有诗一百一十余首，其中可看出为术士所作的有约三十五首，卷二则有《湘潭道中赠丁碧眼相士》、《赠林碧鉴相士》二首。散文中有如《送彭叔英序》、《赠谈命朱斗南序》等序、跋、赠相士之作十余篇。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收诗一卷，共五十七首，其中有赠相士之作如《赠小铁面王相士》、《赠岳相师》、《赠叶子仁》、《赠徐碧鉴》四首。有序文三卷共六十六篇，其中为相士所作有十二篇，如《赠上饶叶宗山序》、《赠富春子孙守荣序》等。相对于文天祥、真德秀两人广阔的交游面与丰富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诗文在其作品中所占比例的确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大得使我们吃惊”。

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中也有十余首（篇）诗文赠相士。刘克庄虽自称“余不通算学，闻人说阴阳运限干支之类，漫不省为何物语，于世之谈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访余者绝少”^②，但事实上他与相士的往来不断，《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此类作品不下三十首（篇）。谢枋得《叠山集》中所收诗文并不多，诗歌《古诗赠相士吴楚峰》、《赠宋相士》、《赠相士郭少仙》、《赠卜者魏易斋》以及散文《赠地理杨南川序》等都是与相士的交往之作。

江湖诗人虽属边缘士人群体，但在宋季文坛举足轻重，他们的诗集中也有不少与相士交往之作，如严粲、徐集孙、薛嵎、刘仙伦、乐雷发、许棐、朱继芳等人皆有类似作品。这些诗人传世作品不多，个体与相士交往之作多为二三首，但若以群体来论，数量则不少。

从上述所列文人文集来看，宋季士大夫与相士的交往不受政治地位、身份、年龄、学术派别的影响，从在朝士大夫到在野江湖士人，从道学名儒到苦吟诗人，都与相士有往来。而士大夫赠送相士作品数量之多，比例之高，则可见出他们与相士的来往之频繁。如文天祥即述自己“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③。姚勉《赠赵神眼》诗中也坦言平居之日“杜门人事少，排闥相师来”。与相士交往是宋季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渡初徐度《却扫编》卷下曾云：“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惜乎这种对相术理性分析的态度在宋季士大夫身上似越来越少见，他们大多对相士及其相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如文天祥甚称江湖术者朱元炳“谈命高妙精绝，尽奄同袍，试以百十命，应对如流”，并专门写了一封信向自己的老师欧阳守道推荐其人^④，他又在《赠萧才夫谈命》中赞相士萧才夫“其神已”。真德秀则赞上饶相士叶子仁“论人寿夭穷十不失一二”^⑤，括苍相士张元显“五行家之巨擘者也”^⑥，相士欧阳可夫“以听声法观人，百不失一二”^⑦。魏了翁平日对相士也颇多许可，并且名声在外，乃至刘克庄对前来打扰他的相士朱俊甫说：“请君留取谈天口，去访横渠与了翁。”^⑧刘克庄对相士持将信将疑态度，诗文中时有讥诮之语，却也不吝称赞相士施元龙“眼毒偏奇中，心灵每预言”^⑨。

这些士大夫对相士的称扬固然有礼仪的因素，相士前来售术，必定有一番追捧的甜言美语，士大夫受用之余，不免将对方抬高一点，以示自己的大度奖携。但在前述交往诗文中可见，士大夫的美誉也非仅是礼貌的客套，而有不少出自真心。他们多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佐证相士术法的神奇，如文天祥《赠萧才夫谈命》云：

①（宋）文天祥撰、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宋）刘克庄《赠上饶日者吕丙》，《全宋文》第32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③④（宋）文天祥《与秘书巽斋欧阳先生书》，《文天祥全集》卷五，第161页。

⑤（宋）真德秀《赠上饶叶宗山序》，《全宋文》第313册，第107页。

⑥（宋）真德秀《送张元显序》，《全宋文》第313册，第124页。

⑦（宋）真德秀《赠欧阳可夫序》，《全宋文》第313册，第126页。

⑧（宋）刘克庄《赠日者朱俊甫》，《全宋诗》第58册，第36455页。

⑨（宋）刘克庄《赠术者施元龙》，《全宋诗》第58册，第36542页。

岁单阏，人鉴萧才夫过予，以予命推之，言颇悉。是秋迄次年，予所遭无有不与其言相符。噫！人鉴其神已。

真德秀《赠顾涇序》中云：

予乙酉（宝庆元年，1225）趋朝，遇之（顾涇）于衢梁。君见谓曰：“公之此行，不满百日当归。”已而果然，盖其验如此，非神而能之乎！

正因为有着成功的经验，所以文天祥、真德秀等人与相士频繁交往，并大力揄扬，推荐给师长、密友。相卜已全面渗入宋代社会日常生活，百姓举凡婚嫁、考试、出行等事情都要先于卜肆中占卜吉凶。然文天祥、真德秀等士大夫并非流俗之人，他们学识修养深厚，有为之努力的理想与追求，为何会与相士如此密切来往呢？这种现象后面必有深层的原因。

二

从外部条件来说，宋季江湖游士之风是士大夫与相士交往增多的社会原因。南宋后期江湖游士大量出现为众所公认，当今学者还对其中的江湖文人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元初方回曾论宋季游士云：“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阊台郡县糊口耳……钱塘湖山，此曹什伯为群。”^①可见在宋季江湖游士中，江湖文人只是其中重要的新生力量，传统的“挟中朝尺书”四方奔走糊口的星命相卜之士有增无减。关于此点，宋季时人多有记载，刘克庄《跋术者施元龙行卷》中称“今挟术浪走四方者如麻粟”，陈耆卿也言当时“术士满天下”^②。宋季江湖游士的大量出现是当时贡举、选官制度弊端重重的后果，是国家政治、经济等矛盾的聚焦表现。游士之风盛行，相士增多，在客观上造就了士大夫与相士密切交往的机会。

相士凭星命相卜之术游走于江湖的主要目的是博取较为丰厚的酬劳养家糊口或买山归隐，也有人希望能在与达官贵人的交往中获取出人头地的机会。士大夫是他们最重要的顾客群，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及第与做官，相士只要能摸准这方面的心理，自可衣食无忧。因此，在士大夫聚居的地方，相士也趋之若鹜。张端义曾云：“临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③文天祥也深晓相士的谋生之苦，其述与相士的交往云：“彼（术者）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闵其衣食之皇皇。”^④文字间对相士颇抱同情与宽容之心。

游士在外行走，必“挟中朝尺书”，即所谓“阔匾”，以装点门面获取更多机会，这导致江湖相士主动向士大夫索要诗文。宋季士大夫不少为相士的赠序之作就成于此背景下，如魏了翁《赠章相士》结尾云：“泚毫赋此诗，为生邮梁楚。”真德秀《赠岳相师》序云：“余方与友人刘定甫论《西铭》，而岳相师来索诗，遂直书以赠。”李昂英则有诗题为《欧阳相士谒书诣梁权郡，书以代之》，这些都交代了其文字是相士“索诗”时所写，为相士远游所赋。对于相士来说，手持一纸清贵权要赠与的诗歌文章，是谋生途中最好的介绍信与必不可少的装备。

但宋季相士是否真能凭这些诗文牟取厚利呢？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刘克庄《赠徐相师》描绘一位奔走于“使君”、“丞相”门下的相士曰：“袖阔日常笼短刺，肩寒春未换单衣。半头布袋挑诗卷，也道游方卖术归。”语言真切朴实，满纸辛酸，可见在宋季政治混乱，经济衰敝的大环境中，相士也谋生艰难，绝大多数只能奔走江湖终其一生。

谋生的需求促使相士主动向士大夫靠拢，而宋季士人阶层分化加剧，相士群体素质有所提高，则

①（元）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②（宋）陈耆卿《赠周生序》，《全宋文》第319册，第80页。

③（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④（宋）文天祥《与秘书巽斋欧阳先生书》，《文天祥全集》卷五，第161页。

使得士大夫乐于与相士交往。

宋季众多中下层士人无法敲开科举与仕进之门，在生存压力下不得已转向其他职业谋生糊口，成为相士也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之一。袁采《袁氏世范》卷中有云：“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无法业儒的年轻人转业相术是被当时社会舆论所容许的。文人分化为相士在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朱熹《赠徐端叔命序》就提到“徐君尝为儒”。宋季相士中更有许多原本是儒士，或者是儒士兼相士。陈耆卿《赠周生序》称周生“有母耄甚，倚其术以活”。周生被称为“生”，可知其原是读书人，上有老母需要养活则透露了他迫不得已从事此“术”的原因。文天祥《送彭叔英序》则大赞彭叔英“以秀才精臞度”，彭叔英是文士兼相士，他还写了一本《谈命录》，文天祥欣然为之作序。但并非所有由儒入卜的士人都得到了世人的宽容，真德秀《赠华相士序》中所记载的华仁仲“以相与弈游缙绅间”，结果遭人讥诮云：“子，书生也，而胡此焉嗜？”华仁仲的被讥诮可见传统的职业高下观点依然存在。

这些由儒入卜的相士不仅深谙风水命理之说，还兼具文士的修养与才情，如魏了翁有诗名为《题陈肤仲、真希元诗卷赠萧道士，萧善为诗，亦解鼓琴》，刘克庄有文《跋术者施元龙行卷》，为相士施元龙的别集作跋。可见这些相士多知书达礼，具多方面才能，相术对于他们来说，是爱好也是谋生技能。他们与士大夫趣味相投，在谈命析理之余，还一起赏析诗文，品题画作，带给士大夫精神的愉悦。这种情形下，其相术的真假反而放在次要地位。

同时，这些相士原本即受儒家教育，有一定理论素养，行动合乎度节。他们谈论方技时不再是纯粹唯心的无稽之谈，也非一味佞言求利，为迎合顾客心理而今日许神仙，明日许功名。他们有的在对命相的解释中加入一些儒家的性命之理与忠孝仁义之论，如相士彭师右曾论真德秀兼有“阳仁阴义”^①。文天祥诗《赠萧巽斋》则誉相士萧巽斋“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有的直言无忌，拒绝谄媚，如文天祥诗《赠曹子政剑客序》言曹子政相人时“如是而福，如是而祸，一无所回护”。魏了翁《赠术士杨坤》称赞相士杨坤在四川吴曦叛乱前有先见之明，而批评“士之黷黷者往往一术士之不若，甚至辱身丧节”，因而非常愿意将杨坤其人向其他士大夫推荐。宋季士风低靡，士大夫中多谄谀之徒与人格扭曲之辈，这些地位低下的相士却行事有气节，因而深受士大夫知遇，被士大夫视为友人。

综上所述，南宋后期社会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大大提高了士大夫与相士交往的几率，就如刘克庄《赠日者袁天勋》云其“多识名公与巨卿，也携贽卷到柴荆”，江湖相士手携当时政界、文化界名人所赠诗文奔走于士大夫之门是宋季社会生活的典型场景之一，连刘克庄这样一个对星命之术并不十分热衷的人，也免不了常受相士“骚扰”。宋亡之后，谢枋得、张炎等过去的士大夫、佳公子都曾以相士身份自隐于江湖，并以此谋生，更是时代强加的无奈。

三

社会风气的变化只是宋季士大夫与相士交往的外部条件，并非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仅仅如此并不能解释文天祥、真德秀等人对有些相士的“心悦诚服”。为更深入了解它，不如潜进士大夫的心灵内部，从他们身处宋季衰世的遭遇与心态来阐释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观机制。

文为心声，要了解士大夫与相士交往时的心态，从他们的交往诗文入手，联系其写作背景来解读应当是较好途径。因钱锺书先生主要提到了文天祥，我们就从分析文天祥的几首诗歌开始：

荣悴纷纷未可期，夕多未振已朝披。得刚难免于今世，行好须看有验时。萱昼堂前惟有母，槐阴庭下岂无儿。好官要做无难做，身后生前是两歧。

^①（宋）真德秀《论命彭君序》，《全宋文》第313册，第137页。

——《赠桂岩杨相士》

贫贱元无富贵思，泥途滑滑总危机。世无徐庶不如卧，见到渊明便合归。流落丹心天肯未，峥嵘青眼古来稀。西风为语岩前桂，若更多言却又非。

——《宣州罢任再赠》

此别重逢又几时，赠君此是第三诗。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凡事谁能随物竞，此心只要有天知。自知自有天知得，切莫逢人说项斯。

——《赣州再赠》

这三首诗是文天祥先后赠与杨相士的，诗中充溢着仕途坎坷、难与天争的消极与伤感情绪。三诗作于咸淳年间，咸淳元年（1265）文天祥年满三十岁，至咸淳十年（1274）的十年间是文天祥大有为之年，且来看看这十年间文天祥的履历^①：

咸淳元年（1265）二月，文天祥接任江西提刑，四月受台臣黄万石等人以“不称职”的弹劾及《龙溪友议》^②之诬蔑，罢职闲居，辟文山山庄。江西提刑任仅两个月。

咸淳二年（1266），居文山。

咸淳三年（1267），九月除吏部尚书左郎官，十二月赴任。

咸淳四年（1268），正月兼学士院权直等职，一个月后被台臣黄镛弹劾免职。该年冬至朝廷起用他为福建提刑，还未上任即被御史陈懋钦奏免。该年仅居官一个月，却被罢免两次。

咸淳五年（1269），四月受江万里举荐差知宁国府，十一月赴宣州上任，十二月入朝。

咸淳六年（1270），正月除军器监等职，六月因草制诰触怒贾似道，七月台臣奏免其职，九月归文山。此次入朝任职七个月。《宣州罢任再赠》约写于该年。

咸淳七年至八年（1271—1272），居文山。

咸淳九年（1273），正月除湖南提刑，三月到任，冬，乞归江西奉亲，差知赣州。

咸淳十年（1274），三月到赣州任，十二月起兵勤王。《赣州再赠》写于此年。

从上可以看出，在宋度宗十年间，文天祥大部分时间居于文山，他三次赴朝，三次被免职，短则为一月，长仅七月。他多次辗转出任地方，却不遑宁居，往往还没有施展开手脚便被免或转任。这种大部分时间落落闲居的生活中，文天祥不仅有精力来营造文山别墅，在“奉亲课子，弹琴读书，流水青山”^③的生活中努力平息内心对政治的渴望，也有时间与各路江湖士人厮磨。然而，这种旋起旋罢的经历，对于文天祥这样一个富有才干与忠君报国热情的士大夫来说，是衰世催生出来的一种折磨，也对文天祥曾有的信念造成极大冲击。

文天祥从小爱读忠臣传，慕乡贤欧阳修、胡铨等人的“忠”，青年时遇明师欧阳守道、江万里，德业文章并进，二十一岁即一举夺魁，名动天下。以他的出色才干与报国热情，本应当鹏程万里，为君王理天下事，为自己树生前身后名。可怜他身处衰世，尽管曾高中状元，被宋理宗称为“宋瑞”，但没有多少发挥才能的机会。他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不仅直言得谤，如弹劾董宋臣、批评贾似道获罪，甚至端居无事也被无中生有遭受弹劾，如《龙溪友议》事件，当然归根结底是他的直言笃行触犯了权臣小人的利益。

① 参考《文天祥年谱》，夏延章撰，《吉安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文天祥之父文仪乃过继给叔父为子，其亲生母亲梁夫人就成为文天祥的伯祖母。后来梁夫人又改嫁到刘家，她病逝后，文天祥为这位伯祖母服“承心制”，即只服心丧而没有丧服等礼仪。这本无可非议，但是蒋永吉、薛绅等人编造印行《龙溪友议》到处散发，诬蔑文天祥“当有重服，匿而不行”。文天祥曾作《通庙堂书》以自辩，欧阳守道也为其说明，但是他当时即被罢职归乡，一段时间后才得到朝廷的肯定。此中，诬陷者捕风捉影，手段无耻，可见宋季政坛难以容下任何清白直言的士大夫。

③ （宋）文天祥《回宁国陈节推容书》，《文天祥全集》卷六，第200页。

在面对一次次弹劾与打击报复后，文天祥会对自己一直持有的信念产生怀疑。因为宋季衰世本来就是颠倒的，强敌侵犯不思防范却一味沉溺于湖山歌舞，民不聊生郡邑凋敝却不施善政爱民，他自己每次竭力为国尽忠却总落得身心疲惫铩羽而归。昏乱的政治现实让文天祥经历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最后在失望中茫然。他不知自己何时会遭弹劾，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现实，只能任其摆布。对于这种无法预料无法改变的现实与遭遇，文天祥最终将之称为“命运”。相士偶尔的一次言中让他联想起自己所有的不偶，他相信这是命运之手的捉弄，而非社会将他捉弄。是因为“富贵在天，生死有命”，而非他所忠之君所爱之国不让他实现功名。这样他才能暂时获得心灵的安慰。

文天祥赠给杨相士的三首诗歌贴切地反映了他在宋季衰世中从直道前行走向失望与茫然的心路历程，诗中流露出人生盛衰无常，富贵前定，仕途危险的思想。“荣悴纷纷未可期，夕多未振已朝披。得刚难免于今世，行好须看有验时”等诗句无疑是文天祥对自己仕宦生涯的回顾与真实写照。他的政治命运就如同自然界的花朵一样，无法预料其盛开与凋谢，甚至还没有完全绽放被人欣赏就已经凋谢，他甚至为自己的刚直做了检讨。“贫贱元无富贵思，泥途滑滑总危机。世无徐庶不如卧，见到渊明便合归”等句写出了仕途的步步危机，表达一种富贵功名前定，对社会退避的情绪。“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凡事谁能随物竞，此心只要有天知”则更进一步表明作者对“物”即命运的无奈，他只能以苍天为鉴，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来消极地与“物”竞罢了。

文天祥的遭遇虽然令人扼腕，但不是偶然现象，与文天祥一样，真德秀也在饱经不测打击后加深了“顺天由命”的思想。其《赠叶子仁》云：

花正纷红俄骇绿，月才挂壁又沉钩。世间万事都如此，莫遣双眉浪自愁。

这一充满理趣的诗歌并非是真德秀的随意之作，而是他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感悟。该诗前有序记其写作背景云：“上饶叶子仁为人推算筮占，往往如破的。岁乙酉（宝庆元年，1225），予方在从班，子仁以书来劝补外甚力，未几去国。进退得丧豫定如此，子仁之术亦奇矣哉。”“乙酉之事”是真德秀政治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在其诗文中常提到。宝庆元年（乙酉）理宗即位，收召人才，真德秀在朝野众望中入朝。六月初四入朝后，他本着道家拯世救人的观点，针对“济王事件”首言三纲五常提醒理宗妥善处理济王身后事。八月宁宗小祥时又上《礼部申论小祥不当从吉状》，力争在宁宗奠仪中群臣服吉不符合儒家典仪。然而真德秀的屡进鲠言及较高民望早激起权相史弥远的猜疑与忌恨，他多次纠合手下党羽弹劾德秀。终于，八月二十七日，在殿中侍御史莫泽的又一次弹劾后，真德秀翌日即被除职与宫观。史弥远等人并未罢休，十一月二十七日，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劾真德秀，真德秀终被落职罢祠^①。此番真德秀在圣意眷眷民望殷殷中入朝，然而立朝不满百日，进之时踌躇满志，而退之日又何其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真德秀从位列三公到削职闲居，大起大落的个中滋味如何，只有真德秀自己体会，他最终通过对“进退得丧豫定如此”的肯定来“自释”。其“花正纷红俄骇绿，月才挂壁又沉钩”中透露的情感体验与文天祥的“荣悴纷纷未可期，夕多未振已朝披”毫无二致。真德秀在《赠徐碧鉴》中又云：“亦既自呵还自笑，只缘骨相合崎岖。”可见这位与文天祥一样有心为国无力回天的士大夫只能转而依求人生无常、命运前定等观念来获得自我平衡。而在《送池师惠序》中，真德秀进一步表明他安时委命的思想云：“于爵禄不必竞而得，患难不必避而免。安时委顺，致命遂志，一无所用吾力焉。”一心一意希望通过信仰道学来振起斯文拯救纲常的真德秀也露出颓唐的一面。

文天祥、真德秀是如此，其他士大夫也常在现实的打击下转而信命、认命。魏了翁宝庆之后被贬靖州，身为“逐客”的他向术士游大有“请一言以探穷”^②。刘克庄富有文才与吏才，一心进取，然而身罹“江湖诗祸”，在宋季政坛屡屡触礁，他在与相士交往的诗作中多抨击现实发泄自己的不遇之苦，如《赠日

① 上述真德秀宝庆元年的行事参考《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乞先次上殿状》、卷一〇《礼部申论小祥不当从吉状》、《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

② （宋）魏了翁《赠术士游大有》，《全宋文》第309册，第468—469页。

者程士熙》云：“少不如人今已老，天之命我子难修。”

江湖文人流品复杂，多为微末小宦或落第士子，其品行受人诟病而命运又着实让人同情。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不乏有才能且忧国忧民的人，但他们不被命运青睐，四处碰壁，尝尽人间冷暖辛酸，胸中一点立功立业的热情早已化成一团死灰，剩下的只有自哀自怜与酸涩之味。曾由基《与中朝故人》中自怨：“自怜骨相太迍迳，为米折腰依旧贫。”朱继芳《赠日者》中对日者说：“送君寻富贵，我命中看。”许棐《赠相士》则交织着淡漠与辛酸云：“涧水溪冰似镜清，自看寒貌已分明。烦君别相江湖友，来岁谁魁淡墨名。”他们甚至拒绝与相士的来往，因为早认清自己寒酸的命运，连相士的花言巧语也无法打动他们的心。宋季江湖文人的真实地位与生活，与相士也已相差无几。

在宋季表面平静实则腐朽的政治环境中，努力没有回报，丹心反被抛弃。对于士大夫来说，不管是先哲的“兼济天下”还是前辈的“先忧后乐”都变得遥不可及，只会碰得头破血流。文天祥、真德秀等人只有在朝廷急需他们装点门楣解决危机的时候才会受到短暂眷顾，更多时间他们只感到君主反复无常，仕途险恶，发出“泥途滑滑总危机”的感慨。在权臣执政下，士大夫想要独善也不容易，朝士人人自危，不知未来如何。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记云：“余曩在太学，尝馆于一贵人之门。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谓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买柴六百贯耶？’”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是南宋后期士大夫生活状态的写照，可见现实政治的残酷多变与士人信念的难守。

由于时代的原因，宋人倡导的“外王”“内圣”体系在文天祥、真德秀等宋季士大夫身上无法实现，在江湖士人身上更趋于消解。他们通过相士的解说将自己苦涩的际遇归因于命运与造物主，在对未知力量的畏惧中求取失意人生中的心理平衡。宋季士大夫与相士的频频交往不仅是普通的社交来往，也是他们为求得内心平衡的主动诉求，那些交往中留下的大量诗文是他们为自我遭遇的吟唱。相士身处官场之外，在四方游走中深体民情，他们作为旁观者，反比一些士大夫更洞察无情的社会现实，更知晓士大夫们“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命运，因而往往能“言中”，得到士大夫“予所遭无有不与其言相符”的赞美。

当然，宋季士大夫虽然平日谈命，但不盲从相士，放弃个人努力，而是主张坚持“道”与“义”，尽个人能力后再再委顺天命。如真德秀《赠上饶叶宗山序》云：“出处有道，语默有时。临死生处利害不惑不变，而惟义之归，此其所以谓知命也。”文天祥《送彭叔英序》也云：“人得之以生，其为性不出乎刚柔，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敢以命为一定不易之归乎？”宋季士大夫并非一味地依赖命，盛宋士大夫自信进取的精神并未在他们身上完全消失。正因如此，文天祥等人会一次次地直言极谏，以抗争与不合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还需提到的是，宋季士大夫这种对现实的茫然与无能为力，把个人成败得失归于造化弄人的心态，放大开来，则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无能为力，用“命”来解释南宋之亡。宋季表面的丰亨豫大与内在的寅吃卯粮，表面的三百年养士之盛与实际的浪费人才扼杀人才，表面的君无失德与实际的昏君庸君，种种矛盾让士人无所适从。他们在国家愈变愈衰时，心底明知它会灭亡，但又不愿接受君昏国弱的事实，只好用命运来解释，认为国家灭亡是天意注定。这种亡国的宿命观在宋遗民所著笔记野史中随处可见。如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与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中皆反复表明这点，诸如“水胜火”、“孤儿寡母之报”、“十五团圆，十六缺”等说法在宋遗民中颇为流行。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不管如何反思痛恨都无法挽回时，则解之以“宿命”，只能更让人为之叹息。

四

钱锺书评文天祥前期的作品“草率平庸”，自然也包括其大量与相士交往的诗歌在内。从大的方面来论，整个宋季文学是宋代文学沉淀、总结的时期，虽有小波澜却无大成就，称得上平庸。从文天祥个人来看，其前期作品相比于后期国亡之际诗文的惊天泣地来说，确实没那么精彩。但是从前文对文

天祥《赠桂岩杨相士》、真德秀《赠叶子仁》、许棐《赠相士》等诗歌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诗歌是作者在被时代捉弄的状态下,油然而生对自己命运的感叹与人生的体悟。这些诗名为赠相士,实际述己之心迹,感情真挚,内蕴深沉,已经超出单纯应酬诗的内容。并且由于写作者的不同身份、经历等原因,宋季士大夫与相士交往的诗文虽题材相同,但在风格上各有千秋,洋溢着个性色彩。

文天祥与相士交往是英雄落寞时的不拘小节,他的这类作品中的确有些是草率平庸之作,但也不乏有气势的作品。如其《送彭叔英序》、《跋彭叔英谈命录》二文时露英雄之大气与刚气,表露了他有远志、尽忠孝、全大义的思想。在《送彭叔英序》中,文天祥记其友人彭叔英精于躔度,推文天祥之命为“刚星居多,意若他日可为国家当一面者”,他对此说不以为然却又颇为自得,云:“予非孔明也,予之志岂叔英得窥哉?”富有豪情。在《跋彭叔英谈命录》中,文天祥更是在分析国之治乱后直抒胸臆云:“盖不幸而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天实驱之,而非夫人之所欲为也。”其舍生取义的忠肝义胆在此全然可见,也是他日后以身殉国的伏笔。

道学家在写作中坚持一贯的明理达用、不事修饰的文学观,往往借与相士的交往之作以阐发“天命”、“气”、“阴阳”等道理,表达自己乐天知命、安穷处退的思想。如魏了翁《赠术士游大有》借游大有阐发应当“共己守道,信天任运”的人生哲学。真德秀《送欧阳可夫序》论“气”,认为“气有清浊,故为哲愚;气有盈缩,故为丰悴;气有深浅,故为修夭”。其《赠岳相师》云“但应内省无所疚,何必从君问休咎”,阐发道学家的“内省”功夫。一以言之,真、魏等人这方面的作品不脱道学家的本色。

江湖诗人与相士的交往诗作中则满是牢骚寒酸之气,不改江湖文人的寒俭之态。如许棐《赠刘相士》云:“满镜秋霜鬓影寒,此生堪笑复堪怜。烦君只相看书眼,更对青灯得几年。”该诗对自己衰老、沧桑外表的刻画,为自己“堪笑复堪怜”命运的慨叹,交织着自嘲与自艾自怨,以及对现实对个人前途的失望。其他如徐集孙《赠相士》云:“山林朝市心殊相,莫误平人枉白头。”《题赠命士》云:“富贵功名世竞痴,清吟往往不趋时。请君多算公卿命,莫要逢人举似诗。”也将江湖文人的边缘化命运与落寞心态流露得淋漓尽致。

宋季奇男子谢枋得的这一类作品也很有特色,其《赠地理杨南川序》一文论“挟风水之术游富贵家”的杨南川云:“杨君心勤而身困,艺精而道穷,世变使之然邪?杨君之命固当然邪?嗟乎,古有负超世绝伦之才,怀出入天入神之技,不为当时所尚,徒有来世之名者多矣。独杨君乎哉。”此处并非仅仅赞杨南川相术之精湛,而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抒自己在衰世所遭受的种种怀才不遇抑郁不平之意。

宋季士大夫不少与相士交往的诗文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颇优秀,是文人个体创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宋季文坛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充《论衡·解除》云:“衰世多信鬼,愚人多求福。”此语颇中宋季士大夫肯綮。当士大夫群体对朝廷和自己未来满怀信心、充满希望时,他们无暇理会相士的无根之谈。然而宋季君主庸碌、权臣跋扈,政治不清、经济衰敝,一切皆无法收拾,只有打碎以后重新来过,是典型的衰世。身处其中的士大夫在宦海浮沉、人生进退中体味了无尽悲哀。国势没落,一切皆朝不利方向发展,他们无法把握人生,更无从左右国家未来,只能借助对未知事物的预测以及对已发生事件的强解来求取平衡。宋季士大夫的大量与相士交往诗文的出现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是衰世中士大夫命运的折射。

[作者简介] 刘婷婷,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发表过论文《周密著述补考》等。